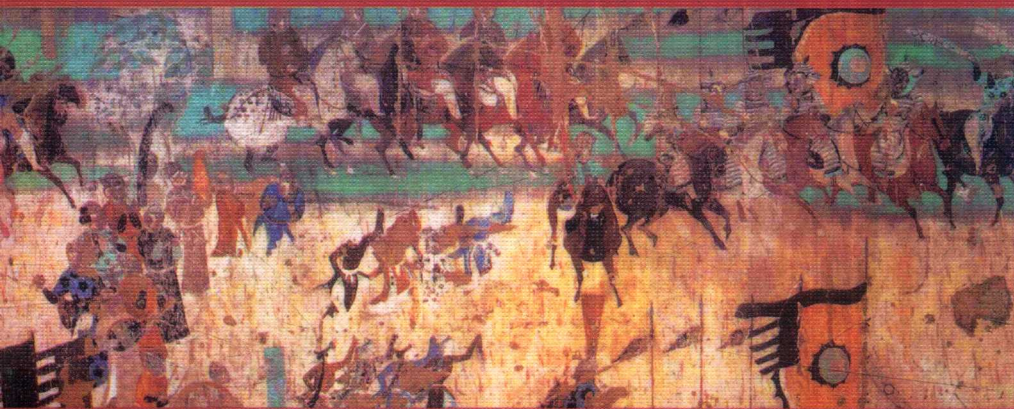


中西学术文丛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EDWIN G. PULLEYBLANK

安禄山叛乱的背景

[加] 蒲立本 著 丁俊译



中西書局

 中西学术文丛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EDWIN G. PULLEYBLANK

安禄山叛乱的背景

[加] 蒲立本 著 丁俊 译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禄山叛乱的背景 / (加) 蒲立本著; 丁俊译. —
上海: 中西书局, 2018.4
ISBN 978-7-5475-1401-6

I. ①安… II. ①蒲… ②丁…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唐代②安禄山(703-757)—人物研究 IV.
①K242.07②K827=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8002 号

安禄山叛乱的背景

[加] 蒲立本 著 丁 俊 译

责任编辑 吴志宏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cishu.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印 刷 上海长城绘图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54 000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401-6/K·265

定 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21-56475919

汉译本序

熟悉西方汉学的人都知道，蒲立本（E. G. Pulleyblank）教授有一本名著，叫《安禄山叛乱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1955年出版，列为《伦敦东方学丛刊》第4种。这本书在考证安禄山的出身来历之后，重点分析安禄山叛乱之所以发生的经济、政治、军事背景，还具体分析了河北地方的形势与李林甫在中央政府专权对安禄山幽州起兵的影响。今天看来，虽然篇幅不长，但确是一本鞭辟入里的唐前期政治史，对西方唐史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蒲立本撰著本书的时期，正好是二战后学术精英荟萃英国的年代，他周边不仅有一些熟悉唐朝文史的汉学家，还有通安禄山、史思明这些九姓胡人的母语——粟特语的专家，可以相互切磋，如恒宁（W. B. Henning）教授帮他所做的汉语专名的粟特语还原，就是一例。

遗憾的是，由于此书出版时，正是中国与西方学界基本隔绝的年代，中国学者能够见到此书的，寥寥可数。直到“文革”结束后，学者们才有机会阅读此书，方知义宁之学，海外亦有传人。1984年我远渡重洋，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进修，得以系统收集蒲立本教授的论著，方知他已改弦更张，转

而研究汉语音韵学了。虽然在音韵学领域，蒲立本仍然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对于唐史学界来说，不无遗憾。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或 90 年代初蒲立本来京参加汉藏语言学大会，业师张广达先生带我去拜见过他，其时已经完全不谈唐史，而只就于阗文书年代和于阗文拼写的汉语文献相互交流。

我因为随张先生治隋唐史，又关注昭武九姓，对《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一书情有独钟，曾多次从北大图书馆借出此书阅读，甚至有动手翻译的念头。1991 年见到香港大学的黄约瑟先生，他说已经翻译完稿，交给台湾某家出版社了。约瑟先生以隋唐史名家，尤其熟悉唐前期政治史，而英文极佳，是翻译此书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可惜这本译著始终未见出版，而约瑟先生英年早逝，1994 年就离开我们。此后我时而询问处理约瑟先生后事的香港中文大学刘健明先生，也说杳无音讯。后来健明先生也移民加拿大，我们连打听消息的线索都没有了。

可喜的是，这本书现在由丁俊君汉译完稿，即将由中西书局付梓。丁俊是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弟子，钻研唐前期政治史之外，兼做吐鲁番文书，也参加我与宪实教授主持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项目，撰有研究唐前期勾征文书的长文。其硕士论文研究李林甫，于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一书曾反复阅读。其后又随宪实教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安史之乱的财政背景，并将杜希德 (D. Twitchett)《唐代财政》(*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一书译出。可以说，不论是从唐史背景来讲，还是从专业英语来说，丁俊是翻译此书的最佳人选。当她和我说起这个意向时，我极力鼓动，并建议把蒲立本《内蒙古的粟特聚落》也一并译出，因为最近

二十年兴起的“粟特热”，蒲立本的这篇文章又备受关注。

现在，所有译文已经厘定，丁俊和中西书局李碧妍女史都希望我来写序。回想我从唐史到于阗，再到粟特，其实还有月氏、龙家、吐火罗，诸项探讨都离不开与蒲立本的论著交涉，拙撰《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一文正是在蒲氏本书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故此我很愿意借此机会，将有关此书前前后后的因缘略加交代，是以为序。

荣新江

2018年2月1日

于北京大学大雅堂

序 言

v

大概在唐代甚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对于远东地区的后人是如此耳熟能详，那就是唐玄宗即唐明皇与他晚年最宠爱的杨贵妃以及安禄山之间的故事，那位与他们关系亲密却最终发动叛乱的胡族将领，致使他们之中一位被迫流亡，一位走向死亡。也许恰恰是因为这个故事是如此地令人熟悉，它背后的那些历史事件并没有从严肃的历史学家那里，也就是往往对那些浪漫故事持正确的怀疑态度的史学家那里，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这个时代的倾向是，极度忽视某个个别人物或特定事件的历史作用，而是去寻求一种长期的历史发展趋势，这也使得他们的重要性大打折扣。不过，我依然无悔于选择这样一个研究题目。

在对这个事件经过了五年左右的研究与思索之后，我更加确信，安禄山的叛乱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我并不认为当事人个人应该对所有的一切，甚至是由叛乱所引发的一些全新的状况承担责任，而是希望，当一个人说起这样的关键性历史事件时，他会认为，安禄山叛乱所带来的后果，只是加速或者改变了之前既有的历史发展方向，并决定性地打破了当时的各种力量均衡，从而为我们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考察唐

代以及稍后的这段历史，提供一个更好的视角。

本书仅讨论一些为叛乱提供准备条件的事件，因此看上去主要是回溯性的。这是我在1948年初于亚非研究院所确定的一个研究课题的成果，也是我在1951年提交给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

在授予学位之后，我很快获得院方的准许去日本进修一年。在那里，我可以查阅许多之前无法看到的日本学者的论著，熟知他们当时在许多相关问题上的观点。令我兴奋的是，我发现我不需要大幅度地修改我的结论。我可以完善其中的许多细节，它们如今已融入在本书当中，不过，我感觉也不需要做出过大的更改。当然，我的视野更宽了，毕竟我的论文完成于三年前左右，如果我重新撰写的话，它显然就不是目前这本书的状态了。但是，我依然认为它足以代表我最新的观点，并且能够接受时间的考验。

我在离开日本之前写过两篇论文，是在本书内容的基础上，就当时存在争议的一些相关问题展开的。承蒙 K. Enoki（榎一雄）教授和东洋文库的 Honda（本田实信）先生的热忱帮助，这两篇文章得以译为日文并发表，它们分别是《安禄山的出身》（《史学杂志》，61，1952年，第330—345页）和《安禄山叛乱的政治背景》（《东洋学报》，第35卷，1952年，第186—206页；1953年，第332—357页）。

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已故的导师，John K. Rideout（赖道德）教授，自从我踏入亚非研究院时起，他就如慈父一般指引我不断进步，我的论题研究的最初阶段也是由他来指导的。我对于他有着一种难以衡量或者形容的负疚感。他的过早离世对

于我个人而言是个巨大的损失。

1949年，赖道德教授离开学院，先是在悉尼任中文教授，后来又到了香港。此后，我的导师便由 W. Simon（西门华德）教授来担任。他是启发我探求许多汉学奥秘的人。在1949年至1950年间，由于他身在远东，我的导师就又换成了 E. D. Edwards（爱德华）教授，他在唐史方面对于我的帮助最大。

我要特别感谢 O. B. van der Sprenkel（斯普里克）先生，他是亚非研究院的一位中国史讲师，1950年，他从中国返回，也是他最早建议我选择这个题目，并且很爽快地阅读了我的初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我还要感谢 Arthur Waley（亚瑟·韦利）博士，他从一开始就对我的论文很感兴趣，而且正是借助于他那雄厚的知识背景，我才得以抓住许多问题面。感谢 W. B. Henning（恒宁）教授，书中有几处关于粟特方面的论述都得到了他的慷慨相助。

台湾“中研院”的 Fu Lo-huan（傅乐焕）先生在理解一些较难的中文段落等方面，为我提供了帮助，同在亚非研究院的那几年，我们分享友谊，也共享学术交流。

vii

学院的中国哲学讲师 D. C. Lau（刘殿爵）先生承担了艰苦的工作，为本书附录中的图表以及索引部分、专业词汇表等标注中文。我非常感谢他为本书所作出的贡献。

Robert des Rotours（戴何都）先生十分友善地借给我中文期刊的复印本，还有《学海类编》本的《安禄山事迹》，这些资料当时在英国很难看到。

我知道，我在无形之中以各种方式从我所有的老师与同学身上都获益良多，包括远东地区、学院历史系以及英国国内的

汉学家们。来自研讨班与公共自习室的不断激励，以及来自学术会议间歇性激励，对我而言都非常宝贵。我只希望，大家没有因为我过多地讨论自己的问题而感到厌烦。

我也不能忘记学院图书馆的全体馆员，他们一直都态度愉悦并乐于帮忙，即使有时是在相当困难且不便的情况下。

最后，我要感谢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为本书的出版提供资助，我曾在那里担任远东历史的讲师一职。

剑桥

1953年11月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安禄山的出身及初次亮相	9
第三章 安禄山叛乱的经济背景	44
第四章 安禄山叛乱的政治背景	73
第五章 安禄山叛乱的军事背景	102
第六章 河北的特殊形势	133
第七章 李林甫专政下的安禄山	145
附录一 关于安禄山传记史料开头部分的具体对比	180
附录二 隋代到唐代中期人口分布的变化	183
附录三 有关宇文融括户的两道诏令	190
附录四 裴耀卿关于转运的两道奏文	194
附录五 唐玄宗时期的宰相及财政官员的社会出身	203
参考书目	227
专业词汇表	239

索引	246
内蒙古的粟特聚落	267
安禄山主要研究目录	300
译后记	308

第一章 引言

1

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安禄山不是个熟悉的名字，甚至对于大多数的中国读者而言，他也仅仅代表着一个浪漫的形象。然而，由于他的所为给远东地区所带来的沉重后果，使得他即使在最伟大的人类历史创造者当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他叛乱之前，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统一的帝国，不断地向它的四方扩张，而在安禄山叛乱之后，中国分裂了，经受着战乱的创伤，势力范围仅限于自身的疆域之内，还要承受来自外族的侵扰；对内，则是地方上寄生且跋扈的军队使得朝廷疲惫不堪，而中央却由宦官控制，勉力维持着不稳定的统治。从此，唐朝再也没有从这个打击当中恢复过来，虽然后来也有过短暂的中兴局面，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更大的分裂，直到进入历史上的“五代”时期。在唐朝之后，也没有哪个中原王朝能够达到这样的巅峰状态，也就是755—756年安禄山以暴力推翻的玄宗皇帝以及他那英明的朝廷所在的状态。

正因为如此，安禄山很自然地被塑造为一位大反派。他的形象被尽可能地刻画得恶劣与卑鄙，即安禄山原本是一个粗野的胡族士兵，依靠阿谀奉承取得了皇帝的信任，不料，他却利用了皇帝对他的宠信，试图发动叛乱，并夺取自己恩主的皇位。这个故事的情节本身并不够丰富，因此很难在下层民众中广泛流传。我的论文有一部分的意图就在于此，我希望当读者看到

我所呈现给他们的安禄山形象时，能够感觉到他比传说中的怪兽一般的形象更为生动，也更为有趣。

我的另一部分意图，事实上也是主要目的，就是重新构架安禄山崛起的历史背景，尽可能地去解读安禄山叛乱的真实本质，以及这次叛乱带来如此灾难性后果的原因。在我看来，似乎还没有人能够完全或者彻底地完成这项任务。即使是在想到这样的问题之前，也必须对那个世纪前后的历史有着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不过，相比较迄今为止的各项研究而言，我还是希望本研究能够为此次叛乱提供一个更好的理解，同时也为我的下一步研究以及其他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一卷所涉及故事情节截止至公元752年（天宝十一载）底，也就是叛乱爆发前三年。这个时段所发生的事件最终导致了矛盾的加剧。接下来的第二卷，我打算讨论叛乱的发生以及具体过程，一直到762年（宝应元年）安禄山的后继者史朝义被平定为止。

在此之前，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界都没有出现过有关安禄山叛乱的专题论著。这看上去似乎很奇怪，其实不然，因为中国史的研究空间是如此之大，而研究者又是如此之少，因此，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绝大多数的研究课题终将是难以论述清楚的。当然，关于安禄山的叛乱，在一般的中国通史中还是会略讲一番的。但是，即使我们忽略掉那些只与这个传奇性故事相关但实际上并不重要的人物，忽略掉那些司空见惯的篡改或者歪曲历史的书写方法，西方汉学家们偶尔投注给这个题目的特殊关注，也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如果没有对于史料的深度阅读，就不可能提出不同的见解，只能对传统说法中的不合理部分表示疑惑，或者是根据后来出现的错误认识，多少凭空地捏造出另一个故事。

真正对于本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唐史

研究者。我最应该感谢的是目前还健在的唐史专家陈寅恪教授。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关安禄山出身的论述，令我受益匪浅，尤其是他关于唐代社会结构的启发性思考，也成为我解决许多问题的一把钥匙。我所参考的中文、日文以及西方学者的论著，都已列入相关注释。

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 R. des Rotours（戴何都）和 E. Balázs（白乐日）两位先生，他们的论著虽然在内容上并不直接涉及安禄山叛乱，但是，对于任何一位西方的唐史研究者而言，他们的言论都是基础性的，非常重要。

关于史料：

目前可以看到的有关安禄山生平事迹的主要史料，包括《旧唐书》与《新唐书》当中的安禄山本传，以及生活于9世纪的姚汝能所撰写的《安禄山事迹》，其中的三卷内容全部是关于安禄山的，若非此书，我们对姚汝能这位作者也许会一无所知。¹除此之外，《资治通鉴》以及它对于各种史料的考证部分，也就是《资治通鉴考异》（以下简称《考异》），也保留了一些有关安禄山的资料。所有的这些史书都是在参考一些更早的史料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而那些原始史料如今早已亡佚。不过，《考异》还是列出了它所使用的史料来源，而且有一些引用还是相当广泛的。我曾在“The Tzzyjh Tongjiann Kaoyih and the Sources for the Period 736—763”（《〈通鉴考异〉及其关于736年至763年间的史料》）一文中指出，这样的引用有时可用来揭示我们现有史书的源头所据。²在该文当中，我也提到，《旧唐书》卷200上，包括安禄山、史思明以及他们的儿子的传记，还有其他两位叛军将领的传记，似乎是取材于《肃宗实录》³的记载，而《安禄山事迹》与《新唐书》（卷225上）当中的相应段落，也同样是出自这一史源，只不过是额外又增补了一些资料。兹以更多的细节来证实。

在附录一当中，有一段《考异》所引用的来自《肃宗实录》的文字，与新、旧《唐书》以及《安禄山事迹》中的相应段落作对比。从中可以看到，除了缩略部分与个别文字的改动之外，《旧唐书》与《实录》的差异非常小。有两处是在《实录》本的基础上内容略有增加，其中一处经考证有误，另一处则有可能是《旧唐书》的编写者理解有误的结果。

以下为与《考异》相关的片段：

1. 天宝十三载正月己亥的《考异》引用了《肃宗实录》的一段文字，其内容在《旧唐书》卷 200 上（第 2a [5369] 页^[1]）略有删节，不过文字极为相似。由于记载不尽一致，《安禄山事迹》卷中（第 2b [90] 页）从《玄宗实录》。

2. 至德二载十二月甲子的《考异》曰，《旧传》云所带马匹为“三千骑”，而司马光采用《实录》的记载，曰“五千骑”。事实上，在我所能看到的所有版本中，《旧唐书》卷 200 上的《史思明传》（第 7b [5378] 页）中所记载的数字都是“五千骑”。不过，《太平御览》卷 112（第 6a 页）引用这条时记作“三千骑”。参照《旧唐书校勘记》第 66 条，第 26a 页。

3. 至德二载十二月乙丑的《考异》，第二条引《旧唐书》卷 200 上（第 7b [5379] 页）曰，史思明于 757 年归朝时所授官职为“河北节度使”，似乎是把河北采访使与范阳节度使两个官职混为一谈了。《通鉴》则“今从《实录》”，记作“范阳节度使”。这很显然只是《旧唐书》在抄写上的一个错误。

4. 乾元二年正月己巳的《考异》曰，遵从《实录》记某位武将的名字为周挚。《考异》所引《旧唐书》卷 200 上（第 8a [5380] 页）记作周贄，与“挚”字同音异体。这显然也只是

[1] 译者注：2a 为作者原用的百衲本的页码，括号中为译者现用的中华书局 1975 年本的页码。以下各注释皆同。即前者为原著页码，括号中为现在通用的版本页码。

抄写时的一个错误。

5. 乾元二年三月壬申的《考异》曰《通鉴》“今从《实录》”。《旧唐书》卷200上（第8b [5380] 页）也记载了这件事情，但是比《通鉴》要简略得多。

6. 乾元二年四月甲辰的《考异》对《实录》内容进行了简述，这与《旧唐书》卷200上（第4b [5373] 页）的记载几乎完全一致。

7. 上元二年三月^[1]戊寅的《考异》引用了《实录》中很长的一段文字，这部分内容在《旧唐书》卷200上（第9a [5380—5381] 页）中只是稍有删节，略改几字而已。唯一的实质上不同就在于，《实录》曰“数万”，而《旧唐书》记作“数千”。这显然也是抄写者的错误。

8. 上元二年三月甲午^[2]的《考异》曰“今从《实录》《旧传》”，意味着这两处记载是一致的。《通鉴》此处是对《旧唐书》卷200上（第9a [5381—5382] 页）内容的删改。

9. 上元二年三月甲午^[3]的《考异》，第二条引用了《实录》中的一段，而《旧唐书》卷200上（第9b [5382] 页）则是简略记载。

在开元二十四年四月辛亥的《考异》第二条，以及开元二十九年八月乙未的《考异》，所引用的传记内容存在争议，但是没有提到《肃宗实录》的记载内容。这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相关事件没有在《实录》当中出现。《考异》在引用史料时并没有系统性的惯例。

以上实例无不证明，几乎《旧唐书》卷200上的所有内容都出自《肃宗实录》。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肃宗实录》是

[1] 译者注：当为二月。

[2] 译者注：当为戊戌。

[3] 译者注：当为戊戌。